

精准扶贫才能消除怪相

纪玉



今日论语

我国贫困人口有多少?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这个数字是9899万人。面对近1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现实,如何让更多人摆脱贫困状态、共享发展成果,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在这个过程中,扶贫工作出现的种种怪相,不时“夺人眼球”,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比如一些贫困县造起豪华政府办公楼,“穷县”与“豪楼”的对比十分刺眼;比如为了争得贫困县的“帽子”、获得优惠政策,一些地方使出浑身解数,甚至将成功“申贫”视为政绩;比如为了保住“贫困帽子”背后的利益,一些贫困地区走入“年年扶贫年年贫”

的怪圈,更有甚者,认为脱贫速度和规模都要有“规划”才行,否则,没有一定比例的贫困人口,“帽子”就保不住了……

这些怪相都说明,原有的扶贫机制必须得到修补和完善。换句话说,就是要解决钱和政策怎么用、用在谁身上、用得怎么样等问题。扶贫要有“精准性”,要用在对的人身上,用在正确的方向上。

新华社受权发布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改进贫困县考核机制、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等,都很有针对性。

我国的贫困人口数据是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抽样调查而来,全国还没有

建立统一的信息网络,尚不能对所有的扶贫对象进行精准识别。仅通过基层政府上报来确定贫困户,难以鉴别,容易弄虚作假。制定统一的扶贫对象识别办法,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并进一步深入分析不同的致贫原因,建立起全国性的信息系统,对扶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具体了解谁需要帮助,需要怎样的帮助,才能知道怎么帮。贫困县的“帽子”也能给得更准确,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群和地方获得支持。

一些地方不想搞掉“贫困帽子”,是为了背后的利益,也在于官员考核机制亟需“补漏”。如果以GDP论英雄,而不看扶贫工作的成效,官员的工作重点当然会发生偏差。既然做不好也没什么后果,就很可能只看重“贫困帽子”带来

的好处,以此来换取政绩,甚至不愿“脱贫”。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就说,“现在客观存在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虽然一些县的经济指标上去了,但是老百姓得到的好处不明显。”《意见》提出,贫困县的考核机制将由主要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转变。这也是让官员专注于扶贫开发的正向激励。同样的,扶贫做不好,应有明确的责任归属;出现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贪污侵吞扶贫资金等现象,更要让责任人依法受到惩处。

扶贫的“精准性”,不仅体现在扶贫对象的识别和扶贫资金的使用上,而且要通过机制的调整,使权责统一、监督到位,才能消除种种怪相产生的土壤。



新民随笔

说说申花

晏秋秋

离开了足球圈,就总不想谈申花,尤其不想谈朱骏。但这次,申花要转手了,我还是想有几句话说。

2007年,朱骏入主申花。此事新民晚报是独家报道,才正是当时的写稿人。事后,有人向我讲述了朱骏开会时的神情:“眼睛很亮,什么条件都一口答应……”稿子见报后,颇为轰动,据说朱骏有些无奈。后来他与我见面,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追问谁给我爆料,二是强调:对申花来说,第二名和最后一名是一样的。

朱骏2月上旬入主申花,3月底,我给朱骏写过一封公开信,文中说“申花整风,越整越疯”,又说朱骏“一意孤行”,文末的话是“等你离开申花之时,留下的印象很难完美”。现在看来,这篇文章缺少与人为善的商量口气。朱骏对此却很大度。

再以后,我因为工作变动,离开了足球圈。三四年,有几位申花队的球员找到我,说朱骏欠薪。我劝他们,还是要和老板搞好关系。队员们却在琢磨,是不是要在球队开会时,兜里放一个录音机……

说实话,7年前我绝没有想到,朱骏能把德罗巴和阿内尔卡请来。德罗巴来的那天晚上,我发短信祝贺朱骏,称赞他“很牛”。可惜的是,德罗巴来了,又走了,还惹来了一场官司。我不太清楚当中出了什么问题,但实为朱骏惜。这件在中国足坛青史留名的事情,却做成了半吊子。

真是应了一句俗语“玩玩,玩玩,不上路”。前阶段,传出申花欠年过七旬的徐根宝的钱,真是没腔调!昨晚,沪上一支“民间球队”年终尾牙。席间,谈起申花近几年的变化,突然有人喉咙粗了:“他倒好,卖了拉倒……”

我是真心觉得,现在的申花队,还是卖给“绿地”好。至少,张玉良是一个要腔调的企业家。3年前,本报曝光文明施工测评“倒数工地”,连续两期“绿地”上榜,市领导有批示。后来我随市民巡访团回访工地时,负责人垂头丧气地说:“老板急了,说我们把绿地的脸丢尽了……”

从朱骏谈起,落在张玉良身上。申花的这个转合,究竟会怎么样?作为旁观者,我很有兴趣欣赏。

管住选人,就管住了根本

权威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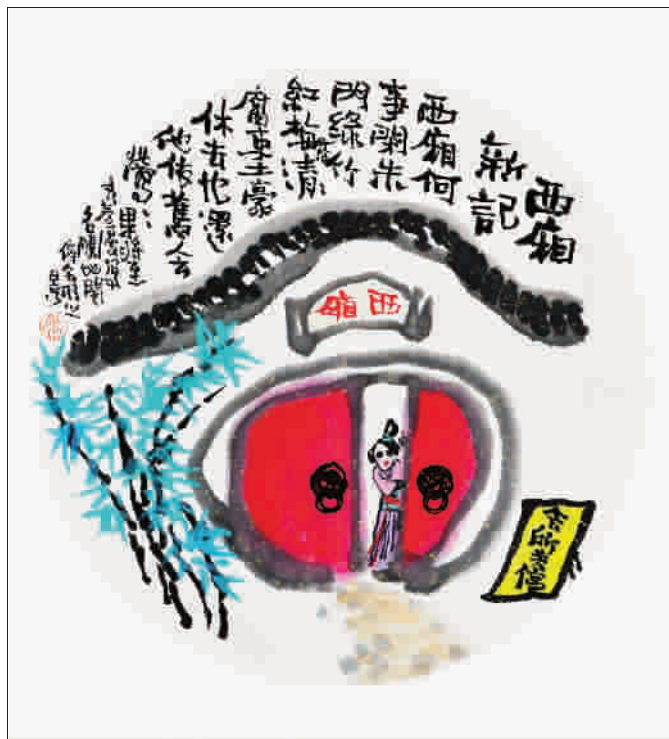
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违规用人、拉票贿选……近日,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再次为干部选任工作戴上金箍、敲响警钟。

此前新修订颁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为选什么人、用什么干部划定标准。治吏的第一步,就是选人用人。管住了干部选任,就是管住了根子。

现实中,凡选人用人上出现的问题,无不与监督不力有关。此次《意见》中提出建立倒查制度,对那些敢于制造问题的“幕后推手”们不啻一声响雷。要达到“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的要求,更需要强化监督,防止被人钻了空子。

管住干部选任,靠制度,更需要制度化的监督。《条例》已对相关监督制度做出了原则性规定,《意见》则从细节上进一步提供了规范和保障。备受关注的倒查机制,可说是干部选任责任制的重要一环,而推荐责任制、考察责任制、决策责任制、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等,都应根据《意见》的要求,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同时,也需以更多信息公开、更好制度手段、更强处理问责,建立一个开放式、立体化、全方位的监督网络。

(张铁 刊今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



西厢新记

谢春彦

西厢何事闭朱门,绿竹红梅冷清清。
腐吏土豪休去也,还他依旧会莺莺。
甲午将至,春彦漫写名胜地关停会所之景。



自由谭

前几天,在市政协大会上,电影导演江海洋委员最后一位发言。结尾时,提到这么一段:“楚有辞,汉有赋,唐有诗,宋有词,元有曲,明清有小说,我们更愿意相信,我们这个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绝不仅仅是段子和小品!”几句话赢得了满堂掌声。他把大家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我体会,江委员倒不是在贬低或嘲讽“段子和小品”。但是,段子和小品演得再好,也不是文学艺术的主体,更不会是它的全部。每个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必须产生能体现这个时代的精神、反映这个时代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愿望的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屈原以他的生命

为代价,写出了《离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吟出的则是历代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的气节;《红楼梦》百读不厌,在于它在众人心中已是难得的“百科全书”;《黄河大合唱》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它歌颂了我们“伟大而坚强”的民族精神……这些作品的高度、深度和力度,都是“段子和小品”所难以企及的。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除了“段子和小品”之外,还能产生无愧于我们国家与民族的作品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没有人能否定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性和庄严性,但

同过去许多历史上的状况一样,正如苏联作家爱伦堡曾说过的:“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在庄严的工作后面,贪污、腐化等问题也日渐孳生。正因为如此,广大读者和观众多么渴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能创作出更多恢弘大气而又形象生动的佳作,震撼人们的心灵陶冶人们的情操,引导人们共同享受真善美的精神盛宴。凡为此而不懈努力的人,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和事业,人们不会轻易忘记。

但是,必须正视的是,文艺圈子内外,在社会价值观念异化、精气

神浮躁的影响下,在一味追求娱乐消遣,对低级庸俗孜孜以求的同时,将文艺的崇高使命弃之不顾,致使“重娱乐、轻教化”“重玩艺、轻内容”的倾向大有越演越烈之势。这就不可等闲视之了,因为长此以往,终将误国害民,尤其是对青少年一代,倘若一个个都因此患上了“软骨病”,那堂堂中国还有什么“功夫”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想起来都觉得有些可怕的。

感谢江委员在政协吐露了心声,但愿大家都来关心,因为这事大家都有份——从上到下,你、我、他!

只有“段子和小品”,行吗?

过传忠

神浮躁的影响下,在一味追求娱乐消遣,对低级庸俗孜孜以求的同时,将文艺的崇高使命弃之不顾,致使“重娱乐、轻教化”“重玩艺、轻内容”的倾向大有越演越烈之势。这就不可等闲视之了,因为长此以往,终将误国害民,尤其是对青少年一代,倘若一个个都因此患上了“软骨病”,那堂堂中国还有什么“功夫”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想起来都觉得有些可怕的。

感谢江委员在政协吐露了心声,但愿大家都来关心,因为这事大家都有份——从上到下,你、我、他!